责编：龚克　E-mail:gongke@ccps.gov.cn　Tel:010—62806124　　2014年6月30日

重温经典

“巴黎手稿”的原始面貌

□聂锦芳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思想界、学术界影响巨大。但在对马克思思想的解释和评论中，这部文献所引发的争论也最大、歧见也最多。

根据最新考证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进行文献还原、思想阐发、思想史透视和当代价值评判，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及其当代发展。

“巴黎手稿”是“巴黎时期”马克思撰写的大量正面阐述和论证自己的思想的著述，与专门摘录和抄写同时代人以及前人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巴黎笔记”相区别，所以它包括了通常被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三份手稿”和关于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评注（简称“穆勒评注”）。这与多年来学界流行的或者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同于“巴黎手稿”、或者把“穆勒评注”归入“巴黎笔记”的划分是有差别的。

在马克思撰写的卷帙浩繁的著述中，除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之外，大半个世纪以来，在思想界、学术界影响最大的作品是一部通常被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献。声势浩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出现的“异化和人道主义”论争等重大理论事件，都与其有直接的关联。它不仅在哲学、经济学领域影响很大，而且还扩展到美学、文学、社会学甚至自然科学等学科领域，以及对资本时代人的处境和社会生活的理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对马克思思想的解释和评论中，这部文献所引发的争论最大、歧见最多。今年适逢这一作品写作170周年，我们根据最新考证对其进行文献还原、思想阐发、思想史透视和当代价值评判，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及其当代发展。

“巴黎手稿”指的是“巴黎时期”马克思撰写的大量正面阐述和论证自己的思想的著述，与专门摘录和抄写同时代人以及前人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巴黎笔记”相区别，所以它包括了通常被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三份手稿”和关于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评注（简称“穆勒评注”）。这与多年来学界流行的或者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同于“巴黎手稿”、或者把“穆勒评注”归入“巴黎笔记”的划分是有差别的。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资本论》手稿写作的时间长达40余年，而其旅居“巴黎时期”（从1843年10月到1845年1月）的著述是在这一漫长的思想之旅中竖立的第一块界碑。与原属同一阵营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试图在观念领域寻求社会变革的思辨方式不同，马克思这时已经转向了对“市民社会”的现实观照。与恩格斯那样进入工厂、实际了解“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途径也不同，他是从研读政治经济学著述开始的。从1843年10月起，马克思先后仔细阅读了15位作者的19部经济学著作，写下了他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批笔记。当然，这期间马克思阅读和思考的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政治经济学，还阅读了很多关于社会主义的法文著作、并通过德法译本了解了英国的社会主义。正是在观察现实和研读他人著述的基础上，马克思逐步产生了表述自己独立观点的想法。这特别体现在原来大段摘录他人著述的笔记本上，评论性的意见渐趋增多，到后来甚至发展为其个人思想的长篇阐释、系统论证和发挥。这样，马克思就形成了写作两卷本《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计划。“巴黎手稿”就是马克思曾经打算撰写的这部书的草稿。

以上的叙述表明，实际上这一时期马克思留下了写作方式的不同、思想表述的差异的两类著述：一类是对同时代人以及前人政治经济学著作的摘录和抄写，其中没有他个人观点的详尽阐发，只有寥寥数语评论或批注，我们称之为“巴黎笔记”；另一类是其思想、观点大量的正面阐述和论证，或者即便由他人的议题引发，但马克思个人的议论却占了相当大的篇幅，我们称之为“巴黎手稿”。根据这种划分，“巴黎手稿”应该包括通常被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三份手稿”和关于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评注。

其中，通常被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三份手稿的原貌是这样的：第一份手稿，共27页。用来写作这一手稿的大张稿纸被马克思分为三个纵栏，每一栏上面都写上如下标题：“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在前16页上，马克思在三个标题下满满写上了从斯密等人著作中细心选择和整理出来的重要段落，并且对它们作了批判性分析。而从22页到末尾这6页，就不再管原来的标题而是贯通起来写下了马克思自己的思想，这就是“异化劳动”部分。第二份手稿，目前只有最后的4页（第40—43页）保存着，前面39页都已经散失了。第三份手稿则是页码并不连贯的散张，内容包括：对第二份手稿第36页和39页内容的补充、整个著述的《序言》部分、对黑格尔的批判以及论述“货币”的一个片断。从放在几乎是最后的《序言》中，我们可以知道马克思写作这部著述的总体考虑和安排。第三份手稿的主要部分虽说只是作为对第二手稿的补充，实际上系统地发挥和阐述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这是马克思学说非常重要的内容。

显然，上述三份手稿并没有包括“穆勒评注”，那么为什么要把它归为“巴黎手稿”的内容呢？因为它较之其他笔记，其情况非常特殊。其中有对穆勒原书的摘录，这或许符合前面我们设定的有关“巴黎笔记”的标准，但问题在于，就通篇看，马克思个人的议论又占了相当大的篇幅——整部“穆勒评注”翻译成中文约3.1万余字，而马克思本人的论述近1.3万字，这在“巴黎笔记”的其他部分中是绝对没有的。而如果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三份手稿”与“穆勒评注”所阐发和论证的观点贯通起来考虑，马克思“异化”思想的连续性、渐进性和层次性就显得更为突出了。这昭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思想无论如何不能撇开“穆勒评注”而只关注那“三份手稿”中的内容，从而看不到“社会关系异化论”对“劳动异化论”的拓展和深化。

还需指出，迄今为止，纵观国内外学术界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无一例外，所依据的版本都是根据德文或俄文的“逻辑编排版”翻译而成的（英文本亦是如此）。但实际上，1982年出版的MEGA2第1部分第2卷刊出了两个版本，除“逻辑编排版”外，还有一个“原始顺序版”。后者是根据“三份手稿”的原始手稿排版的，可以说是马克思当时写作的真实面貌的直接呈现，但可惜的是，国外只有极个别的研究者在其论著中对此稍加提及，而详尽的研究基本上没有进行过；在国内也没有对“原始顺序版”进行过全面系统的介绍，更不用说翻译和编排了，这无疑对我们客观地理解文本的思想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专家视点

构建坚持群众路线和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

□高新民

坚持群众路线，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坚持二者的共同价值理念，确立正确的党与群众、国家与社会关系。邓小平精辟地指出：“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它之所以成为先进部队，它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确认这个关于党的观念，就是确认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这是典型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群众”概念的革命性解读。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同样如此，国家权力只有顺应社会发展需要才有生存基础，国家服务于社会而不是相反。没有这样的共同价值理念，无论是群众路线还是国家治理，都会发生偏差。

公正调节社会关系、维系社会秩序。共产党能够取得政权根本原因是为最广大的民众谋取了根本利益，改革开放能够取得成功也源于提高了广大民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进一步改革需要打破某些现有利益格局，如有些社会所诟病的问题提出多年无法解决，牵涉到诸多政府部门利益、地方利益、阶层利益等。关键在于，如果期待群众相信社会调节的公正性，那么就需要具备基本前提，即公权力自身不成为多元利益中的一元。这一问题不解决，即使良好的动机也会受到社会质疑，因此，切割政府某些部门与市场边界，公权力不与民争利，是基本的要求，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心。虽然打破现有利益格局特别是政府部门利益并非易事，但不如此便无法推动问题的解决，就失去民心。这既是所有执政党、政府都会面临的维系社会秩序调节社会关系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分层大变化时代如何构建群众基础、走群众路线的基础性问题。当然也需要指出，绝对公正对于任何党和政府来说都做不到，因为资源和能力永远都是有限的，只能做到：科学分析不同利益群体的不同诉求，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归宿；照顾同盟者的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既反对脱离群众心理承受能力的冒险主义，也反对跟在群众后面的尾巴主义；重视照顾多数原则，坚持教育、引导原则，等等。社会政策能够让大多数人理解并支持，能够有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就可以大致维系社会秩序，也可以说治理能力大致符合社会需求。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改进党的领导方式。社会管理是国家治理水平的体现。新型社会管理方式已经在基层涌现。如深圳蛇口街道，众多社会组织承担了政府部分功能；北京、上海、广州等都有社会共商共治的典型案例，并取得局部基层治理的良好效果。但这些地方大多属于大城市，经济基础较好，社会组织活跃，公民素养良好，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从中起了核心性作用。但广大的基层社会并非都具有如此先天良好的条件，因此，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探索符合各地具体情况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必要而重要的。需要指出，在坚持党对社会治理的领导作用时，有必要探讨转变领导方式问题。党对社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把握方向、制定政策、基层党组织带头服务等方面，但不等于事事干预、事事亲自管理。当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到自己身上时，各种社会矛盾就转化为党群矛盾、干群矛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社会事务需要通过社会组织来做。一方面，尊重各类社会组织的相对独立性，为其成长、发育提供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加强对新社会组织的引导，加强新社会组织自身建设，以法律规范其行为，以社会监督其不合法行为，充分发挥在其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而不是党和政府直接替代新社会组织的作用。简言之，统揽全局、协调各方，以民主、法制的方式实现党的领导，更符合时代的潮流。同时把握好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关系，既防止社会问题泛政治化，又防止不顾及社会问题的政治影响而过于简单化处理。



建立新型社会沟通机制，健全对话协商、民主决策制度。沟通的实质是明确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彼此关系，寻求共同点，这在利益多元社会十分必要。传统的沟通方式是自上而下、单向度沟通为主，而新型的沟通机制是双向度、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并行的，即1987年党的十三大以来一直强调的社会对话协商机制。从全社会来看，基层通行的大调解、某些社区的“民怨调解室”“民意诉求室”等也属于社会沟通和社会对话协商的形式之一。当然，最好的对话协商蕴含于民主决策中，界别协商，公权力与民众之间的协商，公权力与社会组织、各社会组织间的协商，具体事务决策协商和宏观沟通性协商，等等，都可以起到了解民众意愿、使决策符合民意的作用，亦可化解社会矛盾，维系社会秩序。特别是公共事务、社会政策的制定，需要全社会参与讨论，给各利益相关方以平等的机会介入到决策过程中来。这是保障社会公正的政治制度设计。

把服务融入到社会管理和控制中，以服务的良好形象获得群众认可与社会稳定。无论从国家治理视角还是从群众路线的视角来说，为群众服务、为社会服务都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对社会的管理与控制同样重要。这种控制机制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可缺少的，是国家机器的重要功能之一。在中国，由于国家政治体制的缘故，执政党是重要的控制主体之一。但随着社会相对独立性的出现，控制主体也越来越多，比如，一些社会团体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一部分群众。这也带来新考验：谁能更好地以“软实力”——靠影响力凝聚力和价值的认同而不是单靠强制性手段影响群众。在这一背景下，把社会控制融入到服务中来，以服务获得组织、动员群众的影响力，就是不可缺少的重要问题。

南方谈话后的两次谈话

□倪德刚

邓小平南方谈话公开发表后，全国掀起了学习南方谈话的高潮，推动了思想理论的新解放，改革开放的步伐开始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始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邓小平随后又两次到南方发表谈话。一次是1992年12月14日至1993年2月9日，先后在杭州、上海发表谈话。另一次是1993年12月9日至1994年2月9日，在济南、上海、南京发表谈话。这两次谈话的一些思想也很重要。

少说多做，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才能在国际事务中有更多的发言权。1992年12月17日，邓小平与浙江省领导谈话，他讲，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一定要把经济搞上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动摇。在搞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要搞好精神文明的建设。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我们要冷静观察，沉着应付，“少说多做，要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样在处理复杂多变的国际事务中才有更多的发言权”。

少数人富有，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分配搞不好，就会打“内战”。邓小平在杭州期间，看了1992年12月18日《参考消息》刊登的《中国将成为最大的经济国》和《马克思主义新挑战更加令人生畏》两篇文章后，说：“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那里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战’。”

邓小平这段话，指出了两个“危险”问题。一是要从“变质”的危险来认识和对待两极分化问题。他明确提出，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那里去了。早在1990年4月7日，邓小平在与外宾谈话时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一个含义就是共同富裕。”1990年7月3日，邓小平视察北京时，又明确指出：“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二是要从打“内战”的危险来认识和对待两极分化问题。邓小平明确提出，在分配这个问题上，不能造成打“内战”。1990年7月，邓小平指出：“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亿多人就要革命。所以，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对于“内战”，邓小平有过形象具体的阐述，他说：“一打内战就是血流成河，还谈什么‘人权’？一打内战就是各霸一方，生产落后，交通中断，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响的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

那么，怎样搞好分配，怎样解决两极分化的这个大问题呢？邓小平晚年一直着力思考和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他的思路是：第一，走共同富裕道路，把共同富裕作为中心课题。邓小平指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搞共同富裕。”“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了，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注意内地发展。”“共同富裕，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第二，富裕地区帮助落后地区要具体化。邓小平说：“沿海如何帮助内地，这是一个大问题。可以由沿海一个省包内地一个省或两个省，也不要一下子负担太重。开始时可以做某些技术转让。”第三，通过调节税解决两极分化问题。邓小平提出：“有些地区，允许早一点、快一点发展起来，但是到一定程度，国内也好，地区也好，集体也好，就要调节分配，调节税要管这个。”第四，利用各种手段、方法、方案解决两极分化问题。邓小平说：“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解决两极分化问题。”邓小平强调用各种手段、方法、方案解决分配问题是少见的，足见其对两极分化问题的重视程度和解决这个问题的迫切心情。

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本事是锻炼出来的。邓小平很少给家人写信，1993年元旦刚过，邓小平在杭州给孙辈们写了一封信。他说：“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他在信中，还讲了自己在法国的经历和对晚辈的期望，他讲：我16岁时还没有你们的文化水平，没有你们那么多的现代知识，是靠自己学，在实际工作中学，自己锻炼出来的，16岁就上台演讲。在法国一待就是5年，那时话都不懂，还不是靠锻炼。你们要学点本事为国家做贡献，大本事没有，小本事、中本事总要靠自己去锻炼。

中国有独特的机遇，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特别要避免大的损失。1993年1月22日，邓小平同上海市领导共度除夕，在交谈过程中讲了几点重要的思想。一是不要丧失机遇，对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做出了很多贡献。二是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要避免大的损失。有一点小的损失不要紧，回头总结经验，改正缺点就是了。三是要乘风破浪，脚步扎实，克服困难更上一层楼。

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邓小平没写过诗词，讲话也从不引用诗词歌赋，1993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上海市领导陪同下，冒雨视察浦东，并登上杨浦大桥，眺望浦东开发区的建设情景。在得知该桥是当今世界上跨度最大的斜拉桥时说，感谢上海的工程技术干部，感谢上海的造桥职工，向他们问好。并说这是上海工人阶级的胜利。在视察上海内环线浦东段及罗山路、龙阳路立交桥后说，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并说：“这是出自我内心的话。”

发展经济，能快则快，不要搞快呀慢呀的争论。1994年2月19日，邓小平来到南京与江苏省领导的谈话，这是邓小平最后一次南方谈话。在听到省委领导汇报到江苏省国民生产总值已经提前7年实现翻两番时说：好，好，祝贺你们。指出：现在是机会啊，这个机会很难得呀！中国人这种机会有过多次，但是错过了一些，很可惜！你们要很好抓住。你们要发奋，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聚精会神地搞建设。还指出：“你们发展经济，能快则快，不要搞快呀慢呀的争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经济发展不搞快与慢的争论，是邓小平最后一次南方谈话的最后一个观点。

关于不争论，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讲过这个问题，不争论的目的，一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二是不争论是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在南京最后一次强调不争论，主要是指在经济发展速度上，有条件能快发展的一定要快发展，不要在发展速度上搞无谓的争论。邓小平的不争论的核心就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至于危害党的中心工作、危害四项基本原则、危害国家安全和稳定等错误言论和行为，邓小平是从不让步，而且也从未手软过。

邓小平1992年年初的南方谈话是扭转乾坤之谈，讲了很多别人不敢讲、讲不了的长期束缚人们思想观念的一系列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若干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1993年和1994年邓小平的这两次谈话，有这么两个鲜明特点：其一，谈最关心的实际问题。诸如，两极分化，在发展进程中避免大的损失，少说多做，以实力争取国际话语权，经济发展不搞快与慢的无谓争论等。其二，谈鼓励、希望的话。诸如，高度评价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工作。希望后代在实践中增长本领，尤其是“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这句话，既表达了邓小平这两次谈话时的真实心情，也表示出了邓小平对中国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党的思想史